

## 序章

# 方法的日本與亞洲的文化革命

1. 憲政「國形」與國家戰略
2. 接軌改革與無路可走
3. 亞洲的文化革命

# 中

國學者溝口雄三，寫過一本《作為「方法」的中國》，用意是從中國歷史邏輯中尋找與西方近代相區別的「另類的普世」。這裡輯起來的有關日本的文字，或許可以叫「一個方法的日本研究」。不論是中國，還是日本和東亞，對於西方來說，都是世界的另外一面。西方與東方，自他之別，角度不同，於是有形形色色的學術、千差萬別的看法。在西方思想佔了主導地位的今天，中國人自己的觀察和思考，顯得尤其重要，否則無法避免被主流思想所淹沒。在國內做過一個時期社會學方面的工作之後，筆者在日本學習工作十餘年，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觀察這個「唯一的非西方現代國家」，特別是它與歐美資本主義的差異，並延伸為對於中國自身的思考。

中國是日本的「希臘羅馬」。日本曾經隸屬於中國文明的一部分，只是在近代發生了重大變革。用湯因比的「刺激～反應」的文明觀來說，西歐近代之後的中國和日本，面臨同樣的「刺激」，而「反應」卻根本不同。這個差異也就是近代東亞的分裂和戰爭的根源。爾後日本所走過的道路，基本上是效法西方，民族國家，文明開化，侵伐霸道。戰後，所謂「日本模式」既給東亞和其他後發國家提供了啟示，又提供了失敗的標本。因此，「日本問題」的研究，不單純是一個國別研究，而可以延伸為一種「方法」的思考，延伸為對於西方現代化、民族國家、全球化、以及中國道路問題的關聯性思考。一千多年來，日本人一直研究中國，細得一塌糊塗，大到古典的經史子集，小到中國人的針頭線腦，無所不學，而它近代化的選

擇是「反中國而親西方」，西方近代叫做「文明」，中華正統成了「野蠻」。中國文明的近代衰落，無疑影響了日本的戰略選擇，而現在日本人提出「一個方法的中國」正是來源於對於這個過程的反思。這種反思，對於經過30年市場化改革的中國來說同樣有需求。

這篇〈序章〉，目的是將本書收入論文，及其所涉及的日本政治、經濟體制和文化三個側面，在一個框架之下串聯起來，解析「方法的日本」及其理論與現實意義。

## 1. 憲政「國形」與國家戰略

1989年1月7日，昭和天皇去世。街上的日本人面無表情。葬禮當日，天氣陰冷，一清早就開始了電視直播，古禮、古裝、古樂。我剛到東京幾天，正在看電視，練習聽日語，認識不久的一位每日新聞社記者來了一個電話，他在中國「駐在」過，一口流利的中文。「你對眼前的事情如何看呢？能不能發表一點評論，我可以發在報紙上」。我很意外，回答說，「這好像很難。我看日本民眾很悲哀。要我說什麼？評論這位天皇？」記者說，「隨便說說感想吧，什麼都可以的，想好了請給我一個電話」。

天皇家族大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皇族之一，據說從神武（相當於中國秦漢時代）以來，「萬世一系」。古老的皇室古墳，埋藏著東亞的一個謎，至今不允許考古，人們至今也鬧不清楚天皇來自何處，是中國一系還是朝鮮一系？皇家葬禮的場面莊嚴，間或插上一段昭和天皇的生平：國民盼望已久的誕生，輝煌的婚禮和繼位大典；身著軍裝，騎著一匹高頭大馬，檢閱他的軍隊；同樣身著軍裝，迎接同樣打扮的「滿洲國皇帝」溥儀；用奇怪的日語

唸著「終戰詔書」的聲音；身穿西式禮服與身穿軍便服的麥克阿瑟合影；戰火一片廢墟之中，摘下禮帽，向跪著或者深鞠躬的民眾致意；笑容可掬，在皇宮的賞花會上與日本各界名人聊天，隨便地開著玩笑。

所有這些角色，竟然是由同一個人扮演。一個時代的結束？他經歷了不止一個時代。他的祖父明治天皇變日本為「東方的西洋」、歐洲式的民族國家，與大清帝國、沙皇俄國開戰，割佔臺灣，吞併朝鮮。他自己呢，統帥過一支軍國主義軍隊，對外擴張，奴役他國，治下的子民曾經超過三個億。廣島、長崎遭受原子彈打擊之後，軍人們依然要打到「玉碎」；他無法讓這個民族國家也跟著「玉碎」，終於出面，宣佈結束戰爭，無條件投降，成了亡國之君。大街上一家家書店，展示他的畫冊、書籍，以及各種各樣的評論。我終於打了一個電話，告訴對方什麼也不想說。參加一次日本教授家的聚會，大家一起議論起昭和天皇。教授見過「人的天皇」，他說帝國主義時代，天皇被神化了，其實他的才能不過是一個「小學教師」，性格是個「好好先生」。一位年輕的英國人不顧禮貌，直言「他就是戰爭罪犯」。很簡單，當年駕著自殺飛機的年輕的日本軍人，哪個不是喊著「天皇陛下萬歲」衝向美國軍艦？還有「萬歲崖」自殺的那些平民？按照明治憲法，只有天皇才有「統帥權」，他自己也曾當面向麥克阿瑟承認自己的戰爭責任。近年來，出自宮廷天皇侍從的筆記，描述了他從「9.18」之後，多次不滿軍人的狂妄。人們議論說，他既要扮演「天皇」又要扮演「統帥」的雙重角色。

日本的明治維新，也具有這樣的雙重性格。一方面吸收西洋科技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；一方面效法列強，侵伐霸道，並使其成為列強認可的「民族國家」（nation state）。

康有為稱讚日本的「君主立憲」，力圖效法；孫中山一面欣賞，一面反對；而大清帝國早就已失去了「君主立憲」的歷史機遇。歐洲從傳統的王朝孕育出民族主義，並創設民族國家的憲政體制，日本吸取了這一經驗，有了 100 餘年的憲政史。如何評價「東亞唯一」的憲政日本，如何看待日本現在的「改憲」？〈日本「改憲」及其戰略目的〉一文，企圖給予一種解讀。筆者引用了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說法，他主張將英文的「憲政」（constitution）一詞，譯作漢字的「國形」。西方「民族國家」的「憲政國形」，迅速摧毀了東亞的中國秩序「天下國家」，將這個地區變為殖民地全球化的一部分。

日本「富國強兵」的口號，代表了這個「轉型」國家雙重性格，即近代工業和弱肉強食。這也是所謂文明的「民族國家」的普遍特徵，至今未變。孫中山的日本友人秋山定輔，在兩次周遊世界之後說過，西方的哲理是「不是吃掉別人，就是被別人吃掉」。而「既不吃掉別人，也不被別人吃掉，東洋的道德，哲理，和平就在於此」。對日本而言，「轉型」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功，而對亞洲和亞洲其他的「落後國家」則無疑是一個「被吃掉」的災難。從明治，到大正，再到昭和，在憲政「國形」之下，日本戰爭崛起，將民主主義打成了一個空殼形骸。近代中國落後挨打，「三人行必有吾師」，師法英法美日俄，挨所有師傅打，一步步走向殖民地、半殖民地的命運。而這種命運，與這個死去的天皇，與他所代表的國家與軍隊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戰後日本經歷了又一次「轉型」。從東亞戰略出發，美國佔領當局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，日本接受了美國主持制定的「和平憲法」，以後的幾十年日本甘當老二，在美國的庇護之下實現經濟奇蹟。到 1980 年代末期，日本

的製造業稱霸全球，與美國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。長期以來的美日同盟，日本很難對美國說不，於是才有 1985 年的「廣場協議」，以及造成「失去十年」的泡沫經濟。1991 年的海灣戰爭，日本追隨美國；2001 年 9.11 之後的反恐戰爭，日本依舊追隨美國，用臨時立法的形式，突破「和平憲法」的限制出兵伊拉克、印度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美日同盟逐漸「全球化」，所謂「和平改憲」成為日本當「普通國家」的最大障礙。日本政治家早就提出了當「普通國家」的口號，「改憲強兵」，戰略目標是一方面與美國「對等」，一方面獨立應對他們所認為的「新威脅」，主要是朝鮮半島和中國的威脅。

最近參加一次滬上讀書會，金觀濤先生講述他的「現代性」理論。筆者的提問是從「現代性」的概念出發，中國成為「民族國家」的時間該如何界定？觀濤先生認為，1911 年辛亥革命民國誕生，即中國現代「民族國家」出發點，對此他稱之「現代性第一次高潮」，1980 年代是第二次。不過，那個第一次高潮最終沒有完成社會整合，沒有超越傳統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日本的時間概念很確定。1868 年明治維新，大政奉還，廢藩置縣，日本第一次成為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。中國則很難論，儘管有憲政高潮，至今依舊看不到「民族國家」的「國形」何在。日本在文化上「脫亞入歐」，成為西方哲理的皈依者；中國則我行我素。費正清等史家斷言，中國的封建帝國，從秦漢到明清皆為中央集權，日本則存在與歐洲相似的封建藩閥。歷史既與歐洲日本不同，清末民初的立憲運動，高潮迭起最後是戰火連連，至今並沒有完成。以西方和日本的概念觀察，中國依舊在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中掙扎，還是一個「轉型」國家，可「轉型」到哪裡去？或者如王小強先生的提問，摸著石頭過河，岸在哪裡？歐洲日本的資本原始

積累，殖民主義實踐，以及「侵伐霸道」已經難以重複。如果一定東西方二者擇一，中國或者與西方「民族國家」的文明「接軌」，確立那種「國形」；或是延續「固執中國」，依然另類。

在歷史上，除了支撐中央集權的官僚選任的科舉度之外，日本曾全面接受中國文明體制。中國元素，至今健在。平靜若水的昭和天皇壽終正寢，官房長官即後來的首相小淵惠三手拿一塊白紙板，寫上兩個黑字「平成」，宣佈一個新天皇的到來。這個「平成」年號，與「明治」、「大正」、「昭和」一樣取自中國古典。「昭和」出自《尚書·堯典》的「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」，「平成」出自《尚書·大禹謨》的「地平天成」。日本皇室的傳統之一，年號的選擇主要是《易經》和《尚書》，連源於《史記》的漢字都難入法眼。日本保留的中國文化的遺存多多，秦漢舊俗，漢字唐音，然而它們的功能也僅此而已。1873年日本廢中國曆法，奉西洋正朔，1889年行西式憲政，中國文化成了民俗而非立國基礎。

近20~30年，世界在加速變革。蘇聯解體，冷戰結束，美國主導全球化，並以改造日本的方式改造世界。柏林牆倒塌，北約東擴，還有連續不斷的反恐戰爭，只是手段更加高科技。美軍佔領巴格達，布什總統身著空降兵軍服飛降企業號航空母艦，好萊塢明星一般地出現在感恩節的舞臺上。和二戰不同的是，這一次不像是喜劇更像是一場鬧劇。歷史沒有進步，回到了19世紀。在這個全球化的舞臺上，形形色色舊時代的幽靈「閃亮」登場。某些神聖的東西，很容易被當作道具。西方憲政以及自由、民主、博愛，配上「美國式全球化」的新裝也不過如此。在現實的血與火、生與死、罪與罰的面前，「歷史終結」蒼白無力。柏林牆的倒塌曾使歐洲民眾狂熱不已，隨之而來的並

非永久和平，自由主義的迷夢代替社會主義夢幻，終於還是一個夢想而已，這次是全球化打倒民族國家，近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延續，舊瓶新酒。

在這個大格局下，日本這個國家進退維谷。〈日本的國家戰略〉一文對此作了一個簡略的分析。日本自從緊跟西歐，到追隨美國，國家戰略似乎沒有什麼內容。這一次，日本政府一直在強調「亞洲有事」和「新威脅」，將美日同盟全球化。筆者認為，日本政府的這個「國家戰略」，將會重複「無責任國家」的歷史。小泉內閣的與美國「接軌」的改革，號稱與明治維新、戰後改革並列，但是除了其自以為是之外，思維邏輯並無新意。所謂「無責任」者，指日本決策過程中一定得到「合意」的行動原理，這種原理具有排他性，對自己國民負責，對其他國民無責，所謂「普世價值」也不過如此。小泉內閣為了美日同盟的全球化，用臨時立法派兵伊拉克之外，還堅決參拜靖國神社。他的行動與其說是向亡靈誌哀，不如說是穿一件祭司的外衣，獲得國民「合意」的表演。

1980年代以來，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，被歸結為「傳統落後」的中國經濟，以及中國文化與思維重新復興，似乎再一次挑戰「二元對立」的世界觀。中國的「天下國家」，不是吃掉對方，而是多元一統，和諧共存。西方近代，文明「國形」還在繼續，並演變為美國主義，通過武力移植。從歷史角度觀察，美國的反恐戰爭，與當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、日本佔領南京，並無本質區別，絕非媒體所渲染得那麼理直氣壯。1873年（明治五年），奉西洋正朔不久的日本，用美國黑船來襲那一套，直逼「鎖國」朝鮮的大門，逼朝鮮開國通商，朝鮮人譏其為「醉心西洋，安易變俗，不以為恥」。

日本正面臨對西方近代與中國的反思。戰後日本學



界有過一次反思，幾乎否定了日本近代，說日本是「自我放棄」，追隨歐美；中國則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劃清界限，「固執」地「自我保持」。「放棄」者，囿於全球大勢，不得不放棄；「保持」者，不論世事如何，我行我素，不離其宗。對於戰後的追隨美國的極限，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大約從海灣戰爭開悟，決心改革日本政治，脫離戰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。經過十餘年，「小澤民主黨」終於取得了政權，並開始推行新政，全面反思小泉內閣的「接軌」改革，舉凡憲法外交經濟皆獨立自主，與美國平起平坐，同時，回歸亞洲。中國和亞洲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，長期依賴歐美的日本，也許只有回歸亞洲，才能擺脫經濟困境。不過，日本的「新政」與回歸成功與否，已經不單取決於日本自己，還將取決於中國和亞洲，取決於中國文化的再生與發揚。

## 2. 接軌改革與無路可走

雖然有一個「民族國家」的「國形」，日本資本主義及其各種制度安排（日本人叫「制度裝置」），還是有別於歐美的典型資本主義。在世界其他後發國家，可以發現同樣的情況，儘管市場經濟似乎到處都一樣。日本人喜歡用 Unique 這個外來語，意思和漢語「獨特」一樣，只是用漢字似乎更學究一些，外來語顯得隨意，而日本型資本主義就非常 Unique。把握這種獨特之處，還得使用漢語，於是日本人就造出一批漢字詞彙，這些詞彙甚至流行到中國。明治維新之後的一個時期，日本翻譯的漢字詞彙包括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憲法等等；1980年代則流行過「終身僱用」、「郵儲」和「財投」；現在則有「物流」、「職

場」、「宅急送」之類。日本式資本主義以及戰後奇蹟，不少正是來源這些詞背後的制度「裝置」。

西方思想界和主流媒體，精心研究，反復討論過「日本模式」。不過，他們似乎很難理解日本，理解日本漢字背後的意義。無論將日本的成功歸結於文化、政治，還是其他歷史因素，依舊無法脫離西方人自己的思維定式。這與對於「東亞模式」、「中國模式」的討論，如出一轍。在西方現代的語境之下，解釋「後發國家」或者「開發型國家」所展現的特徵，終究不免隔膜。世界銀行曾用「市場友好」（market friendly）加以概括，界定一種不同於歐美典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，特別是國家與市場的特殊關係。如果換成另外一種角度，東亞社會的市場經濟，在西方現代之前就十分發達，儘管在一個歷史時期，這些國家一律被西方主流所化，其內在的理念和思想依舊頑強存在，並逐漸顯示其另類的普遍性。

本書收入的關於日本經濟及其制度的文章，主要討論這個課題。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後，其制度「模式」也成為批判對象。1980年代末，筆者「滯留」日本，目睹了這個國家從鼎盛到衰敗的全過程，也看到在每個重要歷史時刻美國「教主」的強大影響力。1980年代的日本製造業幾乎「世界第一」，沃格爾同名著述流行一時。美國則陷入財政和國際收支「雙赤字」，美日貿易摩擦，從纖維製品、家用電器到汽車，不斷昇級，其構造與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極其相似。為了緩和和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，協調利益，維持繁榮，日本接受那個著名的「廣場協議」，共同介入市場使美元貶值、西德馬克和日元大幅升值。當時的中曾根內閣以「國際協調」號召國內，實施了市場開放和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。隨著日元的急劇升值，日本財富一夜之間倍增，股市和樓市繁榮昌盛，「驢友」走遍世界。

中曾根智囊制定「國際協調」的一份「前川報告」，官廳學派代表人物大來佐武郎參與其中，他是筆者的老師之一。在國際大學的課堂，他發給大家英文版的「前川報告」，講述那個過程，頗為無奈地說美日關係幾乎到了「戰爭邊緣」，只有妥協。另外一位日本政客則憤憤然，對我們這些外國人說，「那是個賣國報告，希望你們回國別寫那種報告」，似乎那個報告主張一個「不平等條約」。

幕府末年，日本與歐美列強簽訂不少通商條約，承認治外法權，又不懂西式關稅與金融。歐洲的金銀比價為 1 比 15，日本 1 比 6，同量通用，結果是大量金貨外流，財政破產。日本經濟的衰敗，從日元大幅升值引發資產泡沫開始，不通戰略金融而重蹈覆轍，只是歷史條件殊異。此外，美國的政策變化是一個關鍵的外部因素。蘇聯解體，冷戰終結，美國的全球戰略隨之調整。作為世界唯一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，在蘇聯解體之後，迅速將矛頭指向其他潛在的威脅者，首先是日本的經濟威脅。不用說這與 1980 年代「日本收購美國」的那股氣勢有著內在關係。美國斷然要求，日本必須實行自由主義的「市場化」改革，他們高官不斷訪問，推行其教義，尤其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。說起來似乎是個笑話，日本如何與東歐、中國一樣也成了「轉型國家」？可是事實如此。從 1990 年代起，自民黨的歷屆內閣，特別是橋本內閣和小泉內閣，均接受「新自由主義」教義，以美國方式為目標模式，再來一次「自我放棄」的改革。1996 年上臺的橋本內閣，口號是「沒有改革，就沒有發展」，推行「自由、公平、全球化」金融改革；2001 年上臺的小泉內閣，以「構造改革」為號召，「規制緩和」，推行「郵政三事業」、<sup>①</sup> 道

---

① 郵政、儲蓄、簡易保險。

路公團的民營化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日本模式的各種「制度裝置」解體。〈「構造改革」與日美關係〉一文分析了這個解構過程，以及「轉軌」改革的徒勞。

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自由的，它可以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，從鄉村集市到世界市場。支持市場多樣性的因素很多，主要是不同社會生活方式及其歷史與文化條件。東西方市場經濟的差異，或許就由此產生出來，並影響到國家層面。新自由主義也好，「市場原教旨主義」也罷，因為不瞭解歷史與文化，不能將市場活動放在更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之下加以觀察，他們在主張「美式自由市場主義」的同時，恰恰否定了本質上的市場自由。美日之間的市場資本主義就存在來源於歷史和文化的差別。這種差別或許可以描述為，一個是「股東資本主義」，一個是「製造業資本主義」。許多市場要素可能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，「股東的」和「製造業的」同時並存，但體制上的「轉軌」幾乎不可能。日本不具備美式資本主義的內外條件，「轉軌」改革最終無路可走。其政治後果之一，反倒是主持改革的自民黨倒臺。2009年9月上臺的民主黨政權，一方面以「反思改革」號召民眾，一方面開始找尋新路。

關於日本的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，這裡也收入了兩篇文章。一是關於通產省，一是關於汽車業日產與雷諾合併，二者均為日本模式「變與不變」的典型案列。政府參與市場，絕對不是日本模式的專利，美國自由資本主義也決不少政府參與，比如對於尖端的軍事工業和其他戰略產業。在競爭領域的「規制緩和」，決不能代替在戰略產業的「產官學政」的合作以及政策的導向作用。十年過去，通產省已經成為歷史，被經濟產業省所取代，但當年通產省所制定的產業發展戰略正在逐步實施，不少已經成功實

現，這也許就是日本模式不變的地方。日產事例則是一個變相。日本汽車工業已經有參與世界市場競爭的實力，雷諾與日產的跨國重組不會影響日本車全球發展。事實上，由於東西方經營文化的融匯，造就了日產的復興，並且在新興市場創造良好業績。

1990年代，中國改革強調「與國際接軌」，主要與美國「接軌」。日本改革也是一樣，出於「歷史終結論」的進步史觀，強調自由主義及其普世價值，也是與美國「接軌」。有趣的是，自由主義允許異端的存在，「接軌」論者卻似乎將自由主義變成了絕對主義。美國的金融危機，第一次把人們從這種絕對主義的思維中驚醒，重新思考那些似乎約定俗成的教義的真偽，思考超越既有模式的多元主義。經過30年改革實踐，中國積累了市場經濟的經驗，也認識到轉變發展方式和體制創新的意義。經濟背後的文化因素日益引人注目，日本「接軌」失敗的根源之一，無疑在於與美國不同的經濟文化，特別是製造業資本主義的文化。不論是本田宗一郎，還是松下幸之助，日本大企業的經營理念，無非是用最低廉的價格製造最好的東西。這樣的理念如何與美國式的「金錢黑洞」接軌？美國自由主義的觀念之一是，金融強則國家強；日本則是製造業強則國家強。這種經濟文化上的差異，將對各國的市場經濟及其走向發生重大的影響。

### 3. 亞洲的文化革命

雖然存在各種不同的種族和宗教，歷史上的東亞曾經存在一個布羅代爾的所謂「中國世界」。近代除了日本和泰國，各國都經歷了西方的殖民統治，以及爭取民族獨立

的鬥爭，這是亞洲的共性。戰後面對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經濟的雙重任務，亞洲各國都走過曲折的道路，出現一個所謂「發達」的日本，和「落後」的中國、東南亞和印度的差別的格局。1977年，萊肖爾出版的《日本人》一書的扉頁上，有兩幅地圖：一幅是中國與日本的人口與面積，大小一目瞭然；另外一幅則是國民生產總值，日本遠大於中國。此外，冷戰的世界，也造成冷戰的亞洲，美國主導著這個地區的政治地理。1963年，這位美國的「日本學之父」作為美國駐日大使，<sup>②</sup> 與當時日本的大平正芳外相會談，日本默認美國的軍艦和飛機可以攜帶戰術核武器進入日本，日本一直是美國的戰略基地。

美國的亞洲存在，出於抑制「共產主義擴張」的戰略思維。日本和中國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，雖然民間貿易並未間斷。總體而言，日本和亞洲、特別是東亞的關係，經歷過從戰爭、對立、接近到區域合作的歷史性變化。最初有所謂「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」（NIEs）的起飛，而後有東盟和中國加入。1980年代，中國改革開放，回歸世界市場，推動了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區域經濟的加速形成。改革的早期領導人，通過對日本的訪問，定下學習日本和東亞、出口導向、發展沿海經濟的基調，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。中國的改革不僅改變了自身，也更深刻地改變了「先進的歐洲，落後的亞洲」的格局。1978~1995年，東亞的貿易增長獨步世界，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率，亞洲四小龍、東盟和中國，相互繼起互相依存，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。

〈全球化與東亞地域經濟〉一文，針對亞洲金融危機之後，全球化的口號與地域經濟的形成，有感而發。全球

<sup>②</sup> 任期1961~1966年。

化用自己的模式改變世界，而多樣性總是固執己見。冷戰結束之後，分斷多年的東西方世界，人財物自由流動，開始全球化的市場整合。有個統計數字說，1989 年全球名義 GDP 約為 20 萬億美元，全球化使其擴大三倍到 60 萬億，新興國家佔了 31%。加上 1990 年代的 IT 革命，資本大移動加速成長。在這個全球化光彩表面的背後，歡慶勝利者有之，哀嘆失敗者更多，而自由民主的勝利，並沒有結束歷史。柏林牆倒塌 20 年，最近一期《經濟學家》封面，那個東德青年的慨嘆是「獲得的很多，也失去太多」。全球民眾，不論是德國、前蘇聯還是東歐、日本，都在從各自的立場反思，其中不少實在「懷舊」，尤其是東方的社會主義「失敗國家」。

中國的成長離不開世界。中國經驗與日本和東亞模式存在內在的、歷史性的關聯。反過來說，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模式，植根於歷史上存在過的「中國世界」。東亞的新權威主義、在強權之下的自由市場、政府導向下的戰略產業，多可以得到一種東方的、中國文化意義上的解釋。除此之外，與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「虛擬經濟全球化」不同，製造業、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區域內「連鎖轉換」，是東亞區域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。可以說，這裡隱藏著「同時高速成長」的東亞地域的秘密。日元升值、東亞「四小龍」貨幣升值，曾經引發連續的產業轉移，主要是往相對成本較低的亞洲國家，包括中國沿海地區。這個連鎖，一方面帶動了亞洲「落後」地區的產業發展與外向型經濟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投資接受國的國民增收，刺激了進一步的市場形成。東盟 + 中日韓三國的合作，其基礎就此奠定。

由此看來，20 世紀末開啟的世界大勢，並非單一「全球化」時代，同時也是一個地域化時代，或者說是全球

化與地域化並存的時代。在從兩極走向多元的過程中，具有近似歷史淵源的國民經濟體，由於某種共同需要而重新集結。歐盟和東亞經濟圈的形成，正是這樣一個過程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任何經濟模式都會不斷修正自己，經歷過泡沫經濟的日本、經歷過金融危機的東亞，在挫折和失策、被改造和自我修正中，找尋自己的道路，而且是具有共同性的道路。這些探索，並非是區域經濟的短期策略，相反，由於內在的經濟關聯性，通過貿易和投資的相互轉換，一個以「製造業經濟」為核心的「東亞經濟共同體」正在形成，「地域整合」將可能是一個長期的歷史趨向。

美國金融危機，正在加速東亞朝向共同體化的整合。〈金融危機與亞洲的文化革命〉一文，給這個可能的歷史過程一個大膽的說法，即「亞洲的文化革命」。在三井公司新加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，一位企業界的老者，不僅在會議上使用這個來自中國的概念，而且與筆者私下反復討論。企業界的亞洲整合，遠遠超過理論家的想像。不少跨國公司，在新加坡這個東西亞的交匯點上建立運營中心，左看印度中東西亞，右看中國，還有地域內人才的培育、流動化和高度化。老者所強調的是回歸亞洲和日本人長期以來輕視亞洲的「意識革命」，筆者則將這個概念延伸為對東亞整體的反思。西風東漸，歷經百年，亞洲人的思維和話語，幾乎被歐美文化所淹沒，造成有著共同文化淵源的地域解體。歷史演變至今，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域，因為共同的需要而有了重新凝聚的條件。

長期以來，美國市場「發動機」既支撐東亞地區的製造業出口，也吸納鉅額外匯儲備的美元回流，支持美元霸權，從日本到中國，歷經滄桑，主流未變。這種既存的國際關係，制約著亞洲自身的發展。改革 30 年，中國正在重



複日本的過去。被稱為「世界工廠」的中國，建立在龐大的人口和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基礎之上，其脆弱可知。中國和亞洲的兩難選擇在於，或者繼續依賴美國，維護美元霸權，跟著華爾街沉浮；或者走向「另外一個世界」，獨立謀生。建立自由貿易區、亞洲版的貨幣基金，是自立謀生的內在需求，最終將可能形成亞元經濟體。

亞洲最令人悲哀的不是物質的貧困，而是思想的貧困。傳統「中國世界」的核心價值強調平等和責任，並擴大為一種相互包容。孔子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曾被西方人奉為最高的道德準則之一，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並沒有力行，甚至反其道而行。而根據這一觀念，西方的普世價值，並不能代替亞洲人的固有價值，這也是「普遍寓於特殊」的應有之意。維繫這種價值，不僅是道德選擇，也是理性選擇。共同富裕，澤被大眾，才有可能實現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、民族國家的長治久安。美國的金融危機，標誌著自由資本主義「貪婪合法化」的體系危機，也是1990年代以來日本、中國與美國接軌的終結。少數人佔有財富的社會，終究無法持續。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，還存在著地區差別、城鄉差別，如何利用國家和社會的力量，平衡市場競爭，增進社會公平，將是一個長期的課題，而其他的亞洲後發國家面臨類似挑戰。優勝劣敗、弱肉強食的西方價值，造成中國傳統和近代化的文化失調，金融危機的自我否定，自然地引發文化的反思。傳統的「中國世界」及其文化含義，在現代形式下正在復興，受到世界的關注。歷史並沒有在新自由主義那裡終結，歷史剛剛開始，從中國和亞洲的「文化革命」開始。

許倬雲說，「中國本是天下國家，在中國觀念的普世秩序下，曾包含許多族群。中國固然也是一個文化觀念，但其中也容納了許多地方差異」。依筆者的理解，天

下者，民之謂也；天下國家，民之國家也。西方式民族國家，缺乏這種廣大深厚的族群包容，無非是歷史長河中一瞬而已。天下國家觀，也有人稱之為文明國家觀，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，這也許是亞洲的文化革命的歷史含意。一位日本的大學校長，談到中國史時曾經說過，「中國不是一個國家，而是一個世界」。這個「中國世界」及其所代表的天下國家，隱含著超越近代西方，超越狹隘民族國家，超越美國自由資本主義，建立通向另類普世的可能性。